

朝鮮戰爭初期中美失誤之探討

◎ 郭平

二十世紀50年代初爆發的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這場戰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把它列入二十世紀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戰爭之一，看來也不過分。

當年杜魯門總統沒有能夠使美國人民理解「員警行動」的真諦，但他卻在無意之中暴露了美國的戰略思想；至今我們都沒有停止指責美國人不能領悟周恩來總理半夜召見潘尼迦大使的良苦用心，但我們也應檢討，請印度做「紅娘」是否明智。

「消失的過去，有時卻比正在展現的當今或將來，更能揭示急劇的變化。」¹今天，發動這場戰爭的人、介入這場戰爭的人或制止這場戰爭的人都已成為歷史，而想要通過戰爭來解決的問題卻依然如故。交戰雙方對這場戰爭的理解相去甚遠，而重燃戰火又並不是天方夜譚，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場戰爭還遠沒有結束。這也許就是現在官方不能完全解密，人們無法了解、認識這場戰爭的原因吧！但這又恰恰使得人們渴望了解、認識這場戰爭的心情更為迫切。

一 一語泄天機

1950年6月29日，星期四。美國總統杜魯門舉行了自朝鮮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

這一天的早些時候，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聽取有關朝鮮戰事的彙報時，發現國防部長詹森，在準備發給麥克亞瑟將軍的一項指示中，有美國正在計劃同蘇聯作戰的含意。他立刻堅決地制止了這一做法，並十分明確地指出：「我不希望含有任何這種計劃的意思」²。

杜魯門總統在任職期間，共舉行過三百二十四次記者招待會，平均每一個月要舉行三到四次，面對眾多記者的提問，他總是在會前作充分的準備。但儘管如此，他所發表的一些突然的，無法預測的言論，卻往往使這個受原子彈和冷戰政治思維影響的時代發生奇怪的矛盾。這一次他又要出語驚人了。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和艾奇遜一樣，他倆事後在各自的回憶錄裏都不提這次記者招待會。

記者問：總統先生，我們的國家裏每個人都在問，究竟我國現在是否在打仗？

總統答：我們並不是在打仗。

記者問：總統先生，你能否詳細解釋一下「我們並不是在打仗」這句話，我們能引述這句話嗎？

總統答：可以，我准你們引述我的原話，大韓民國是在聯合國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遭受近鄰北朝鮮的一夥匪徒的非法進攻。聯合國舉行了會議，請求它的會員國解救韓國，制止匪徒對大韓民國的襲擊。就是如此而已。

記者問：說這是在聯合國領導下的員警行動是否對呢？

總統答：對的。實際就是這樣。³

杜魯門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稱之為「員警」，把北朝鮮軍隊貶為「匪徒」。眾所周知，員警代表著正義，匪徒代表邪惡。杜魯門是在利用記者招待會作政治宣傳，這是顯而易見得。反應敏銳的記者馬上以「員警行動」來概括杜魯門的談話，這也正是杜魯門想要表達的意思。

透過這一問一答，人們不難看出，杜魯門除了在作政治宣傳以外，還在向大眾媒體，特別是向蘇聯人傳遞某種信息，表明美國雖然在朝鮮作出了迅速強烈的反擊，但並不想使衝突進一步擴大。顯然派員警去執行某項任務與派軍隊去完成使命是有本質區別的，雖然美國派出的並不是員警而是軍隊。但杜魯門卻降低調門並否認美國是在打仗，甚至不願用戰爭這個詞，而同意用「員警行動」來形容這場戰爭，他在鼓吹美國介入朝鮮內戰是為了恢復那裏的和平，恢復原來的疆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⁴的同時也表露了他本人對這場戰爭的詮釋及願望，這將是一場局部的和短暫的戰爭，一場不想擴大的戰爭，即有限戰爭。同年9月1日，杜魯門在向全美國作廣播講話時，對美國在朝鮮的目的和意圖進行了更為明確地闡述：「我們不希望朝鮮戰爭擴大成為一場大戰，這場戰爭將不至於擴大」，接著他又威脅說，「除非共產帝國主義將其他軍隊和國家拖入反對聯合國的侵略性的戰爭」之中⁵。

多年以後艾奇遜國務卿也承認，「朝鮮戰爭一開始，杜魯門總統便打算在那裏打一場有限戰爭，他這種決心得到了國務院和國防部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堅決而有力的支持」⁶。其實，當時蘇聯也沒有打世界大戰的意圖，甚至到了1951年初，中國人民志願軍打了三次大戰役以後，蘇聯還在向美國發出不想在朝鮮打仗的信息⁷。不過，兵不厭詐，美國未必敢信蘇聯人的話。杜魯門當時考慮的主要對手不是中國而是蘇聯，他根本就沒有感到他在6月27日就朝鮮危機所發表的聲明中，有關「臺灣地位未定」給中國人內心所造成的震驚和傷害。他也更沒有估計到「員警行動」會給美軍在清川江一線帶來災難。表面上看美蘇兩個大國之間好象達成了某種默契，如果不出甚麼意外的話，杜魯門會如願以償，他將後發制人得到整個朝鮮。

但現在問題的關鍵，已不再僅僅是蘇聯人對這場戰爭持何種態度，雖然蘇聯不願更深的捲入這場衝突，但卻勸說、鼓勵中國介入，但當毛澤東下令出兵朝鮮後斯大林卻又不願派空軍了，所以現在要看中國，要看毛澤東主席對這場戰爭任何理解。毛也想介入朝鮮戰爭，已到了這個分上，他認為對於新中國來說，「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⁸。而且毛也只想打一場局限在朝鮮境內的戰爭。所以，他也竭力將這場戰爭引入他所希望的有限戰爭的範圍，在這一點上他以及斯大林與杜魯門倒是不謀而合。

杜魯門用了一句「平凡的話」即「員警行動」來表述美國介入朝鮮的這場戰爭。但在毛澤東的眼裏這可不是一句平凡的話。自比為猴子的毛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一言一行。現在我們知道，毛當時將日常工作交給了政治局和周恩來，只是通過周等少數幾個人與外界保持著聯繫，大摞的關於朝鮮戰事最新的情報直接進入毛的「菊香書屋」，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潛心研究朝鮮局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已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憑他的嗅覺，他抓住了這次記者

招待會的實質，即「員警行動」的後一層含義——有限戰爭，並予以利用。

當時擔任周恩來總理的軍事秘書、總參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將軍，在其回憶錄裏談到了毛澤東非常慎重地給中國人民志願軍命名的過程。剛開始毛用「支援軍」命名，但總覺不妥，雖然毛也想介入朝鮮戰爭但又不願與美國公開宣戰，從而把戰火引入到中國境內，儘管他也做了應付這種最壞局面的準備。所以毛在以甚麼名義出兵的問題上「頗費了一番腦筋」，並堅持就「支援軍」的提法在黨內外徵求意見。果然，有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也認為「支援軍」的提法有問題，要求見毛。黃老先生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講：「支援軍，顧名思義，那不是派遣出去的，誰派遣出去的，不是國家嘛，那不等於說我們公開向美國宣戰」⁹。這位清末舉人也看出新中國不能向美國公開宣戰。毛突發靈感，也可能他想起了斯大林10月1日發來的急電，斯大林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人員立即向三八線運動¹⁰，就隨手改「支援軍」為「志願軍」並解釋說，「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¹¹。

8月初中國為對付朝鮮戰爭的爆發而組建的「東北邊防軍」進行了戰爭動員。專程從北京趕到瀋陽來的邊防軍副司令蕭勁光在十三兵團軍、師級幹部會議上宣佈未來的作戰任務時稱，部隊出國作戰時將使用「志願軍」的名稱，同時中國不準備對美國公開宣戰¹²。

杜魯門發表「總統聲明」之後，周恩來根據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將軍的建議，緊急向北朝鮮派遣了一個軍事觀察組，不過名義上還是稱「中方使館工作人員」。這個觀察組的組長柴成文將軍後來回憶也說，戰爭開始時，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級官員，都很不理解為甚麼中國軍隊不能堂堂正正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出兵，而叫甚麼「志願軍」，等到中國軍隊發動的第二、第三次戰役結束之後，人們才明白了其中的「奧秘」¹³。

西方史學家同意這樣的說法，「用這樣的名義參戰是為了使戰爭不致超出朝鮮半島的範圍」¹⁴。憑新中國的實力和蘇聯人的意願，社會主義陣營不會主動將戰爭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域。蘇聯史學家認為，「毛澤東預見到這場戰爭最終是局部的不會超出朝鮮半島」¹⁵。雖然中共中央不能明確判斷美國對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將會作何種反應，但認為屆時中國不外乎將面臨三種可能，「（一）鄰近戰爭，國內平安；（二）鄰近戰爭，國內被炸；（三）鄰近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捲入戰爭……」¹⁶，而在制定各項政策時則立足於第二種可能，爭取第一種可能。若出現第一種情況，這對中國是最有利的「則我可應付裕如」¹⁷。8月13日東北軍區司令兼政治委員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受中央委託作報告。他最後總結說，「一個半月的事實證明，美國帝國主義者雖然發動了侵略戰爭，但美國的戰爭動員和戰爭準備還沒有完全做好……所以這一場戰爭只能是局部性的」¹⁸。高將這次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彙報，毛肯定了高崗的判斷，「八月十五日送來你在邊防軍幹部會議的報告收到了，這個報告是正確的」¹⁹。

不管毛澤東是否還獲取了其他甚麼情報和信息，即使最後關頭，在斯大林產生「動搖」，決定蘇聯空軍「暫緩出動」的時刻，毛還是下狠心出兵朝鮮，說明他已經斷定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只能打一場有限戰爭，而杜魯門總統的這次記者招待會以及9月1日的廣播講話都是這種信息，正如布萊德雷將軍1950年11月28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為麥克亞瑟將軍開脫所解釋的那樣，「士兵們耶誕節可以回家了」的聲明「原是說給中國共產黨聽的，向他們表示我們在朝鮮並沒有長遠的打算，也不打算繼續戰爭」²⁰。海軍部長法蘭西斯·馬修斯，同年8月25日在波士頓就美國的外交政策「冒失」地發表的講話，就又暴露了更多

的問題，他稱美國應該打一場「預防戰」，而杜魯門卻痛斥了這種戰略，「我一直是反對這種戰爭的，甚至不願想到它，再沒有比以戰爭制止戰爭的想法更愚蠢了……」²¹。馬修斯後來在向總統道歉時解釋說，他是受了將軍們的影響，「他聽到他們那麼多人在談論『預防戰』，而他也就重複了這句話」²²。鑒於這些隨便的講話和聲明所引起的混亂和可能暴露軍事機密，杜魯門總統便在12月5日向政府所有部門和駐外機構發出了命令和警告：「不得未經國務院許可發表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新聞電訊或其他公開的聲明。」駐外軍事指揮官和外交代表只可發佈和本部門有關的例行聲明，且必須極端審慎，避免直接透露有關軍事和外交政策²³。但這些補救措施可能為時已完。

雖然杜魯門不願將「預防戰」與「有限戰爭」聯繫起來，其實從將軍們都在淡論的「預防戰」，已經可以初見「有限戰爭」的端倪。

美國在朝鮮的這場衝突中，所追求的戰爭目標是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而改變，他們想得到整個朝鮮「卻又想不至於觸發戰事擴大，美國需要讓有力量擴大戰事的國家，尤其是蘇聯和中共，相信美國的確只有有限的目標」。²⁴但這反而成了堅定毛澤東介入朝鮮戰爭決心的原因之一。

美國人在這場戰爭初期的動向無疑暴露了美國的戰略思想，這使得中國人大致把握住了美國的意圖和最後的決心。按照有限戰爭的理論，「只有在雙方想使戰爭成為有限的時候，戰爭才能保持為有限」。但是，應該切記，在交戰雙方都只想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情況下，「通常雙方都不願把自己有限目標和方法讓對方知道」²⁵，而敢下大賭注的一方將在這種博弈中佔上風。因此這種只想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戰略以及這種戰略的過早暴露，使得美國在戰略上處於劣勢。

二 尤三姐之死

1950年9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了一次突變，美軍在仁川登陸成功。為此西方世界一片歡呼，要求「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此時由於軍事上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南、北朝鮮是兩個國家這種事實也不認可了，以為無「疆界」可言。

10月初，中國政府初步確認南朝鮮軍隊已越過三八線進入北朝鮮，美軍也緊隨其後有佔領整個朝鮮的企圖。在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國軍隊「立即向三八線運動」和金日成首相求援的電報之後，中國最高層領導多次召開政治局及軍委擴大會議，經過反覆權衡、磋商，最後於10月2日原則上決定出兵朝鮮。就在毛澤東主席發出準備出兵的指示不到二十四小時，周恩來總理又作了一次外交努力，即通過印度傳話，警告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從而起到威懾美國使其知難而退，達到「最好不打這一仗」的目的。

然而，威懾成功需要兼具三個要素，首先必須要有力量，其次要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意志和決心，最後要使潛在的敵人清楚地認識到以上兩點，關鍵是這三個要素還必須同時成立，如果其中有一個要素不成立，威懾將失敗²⁶。

美國人不相信新中國具有與世界上第一強國抗衡的力量。這種觀點在當時普遍存在，就廣義而言這種判斷是正確的。甚至當時蘇聯也懷疑新中國是否有能力介入朝鮮與美國抗衡，這使得他們在履行諾言派空軍參戰時猶豫不決，怕一旦中國敗下陣來，蘇聯就可能被牽連其內，

從而導致蘇美之間的直接衝突²⁷。

雖然事後美國某些高級官員稱，美國政府以及一些觀察家相信，「中國有軍事能力使勝利的天平翹向北朝鮮人這邊，甚至有能力的把美軍從整個朝鮮半島上推出去」²⁸。但美國遠東最高軍事指揮官麥克亞瑟將軍對中國人卻不屑一顧，他曾在1949年中共解放南京後，輕蔑地對美聯社記者托賓說，「給我500架飛機，就可以摧毀他們」²⁹。他也根本不願去了解他可能的對手。十幾年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還以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統帥是林彪，並聲稱得到了「中國發佈的一件林彪將軍的官方傳單」³⁰。麥克亞瑟的這種輕敵情緒影響了美國的很多高級將領，甚至總統本人，他們最終聽信了麥克亞瑟將軍的推斷，認為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中國已失去了介入朝鮮戰爭的時機。戰爭初期，美國最擔心中國和蘇聯介入的時機有兩個，即8月上旬聯合國軍眼看就要從釜山防禦圈被趕下海的時候，接著是仁川登陸的時候。但現在，按麥克亞瑟的話說，美國已處在「示強而不是示弱的時刻，我們再也不能卑躬屈膝」了³¹。

美國對中國人的意志和決心也表示懷疑。正如《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雷斯頓在評述華盛頓對印度政府轉達的警告的反應時所稱，「儘管共和黨確信中共總是按克里姆林宮的吩咐行事，但叫毛澤東自殺總是要猶豫一番的」³²。他們不相信一百多年來一直是被欺辱，任人宰割的中國人，竟然有反抗世界第一強國的決心。多年後日本自衛隊在分析總結朝鮮戰爭時也認為，「畢竟難以想像毛澤東的戰略喜歡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進行正規的武力較量」³³。二十世紀末辛格博士論述朝鮮戰爭時認為，新中國決心向世界第一強大的軍事強權挑戰，實非易事³⁴。

中美之戰已迫在眉睫。唯有周恩來總理認為和平還有一線希望，或許他要做到仁至義盡不給人留下把柄；或許在他內心深處不願打這一仗，畢竟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太深重了。二十年後的1970年10月，當毛澤東、周恩來、金日成相聚北京再次談起朝鮮戰爭時，毛對金說，周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蘇聯見斯大林的³⁵，「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決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³⁶。

周恩來想使美國人清楚、明白中國具有介入朝鮮戰爭的力量和決心。10月3日凌晨1點，他緊急約見了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先生。周首先就印度總理尼赫魯在這場衝突中對和平所做的貢獻表示感謝³⁷，然後請印度轉告美國政府，第一，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軍果真如此的話，中國不能坐視不顧，中國要管，這是美國政府造成的嚴重情況。第二，中國至今仍主張和平解決朝鮮事件，不但朝鮮戰事必須立刻停止，侵朝軍隊必須撤退，而且有關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內會商和平解決的辦法³⁸。

事前，周恩來曾煞費苦心地與譯員一起字斟句酌，看如何翻譯才能將他的意思，即，中國人的決心表達清楚。他認為關鍵就在中文的哪個「管」字上。如何管甚麼時候管，他又不能告訴信使，但卻還要把話講的相當有份量。接著他在選擇約見大使的時間上，也可謂用心良苦，按他的處事為人，如果不是因為有特殊的情況他決不會在三更半夜去打擾一位大使的，但這些都沒有能引起美國人的警覺。

其實在這之前的9月21日，周恩來總理、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就曾先後分別會見過潘尼迦大使，事後潘尼迦也及時向印度政府報告了與周、聶會談的內容，報告稱，如果聯合國軍進入北朝

鮮，則中國參戰的可能性將極大增加³⁹。

印度政府馬上向英國和美國通報了潘尼迦報告的內容，同時印度國務秘書巴傑帕在與美國駐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會晤時，也表明了印度的態度，即，如果聯合國軍特別是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很可能將在朝鮮參戰，這將極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印度可能因此不支持聯合國在三八線以北的軍事行動⁴⁰。

9月27日，英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格雷夫斯與美國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麥錢特會晤時討論了潘尼迦的報告，格雷夫斯稱，英國人「並不十分重視潘尼迦的憂慮，認為此人反復無常，是一個不甚可靠的報告者」⁴¹。

美國華盛時間10月3日5時35分，艾奇遜國務卿被叫醒，他收到了一份代號為NLACT的電報（意思是，無論白天或黑夜都要提醒國務卿注意）。潘尼迦大使的信又傳到了，但艾奇遜對此還是不予重視，「他批評印度大使是共產黨的走狗，認為他的警告『只不過是驚慌失措的潘尼迦的愚蠢的想法』」，艾奇遜對英國人說，「這很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恐嚇，我們不應過分緊張」⁴²。

差不多同時，美國駐莫斯科、斯德哥爾摩和香港的外交機構也都給美國國務院發回急電，「報告了所得到的關於周恩來與潘尼迦談話的內容」⁴³。然而，美國人並沒有去認真研究周恩來的警告，他們與英國人一樣，反而對印度大使潘尼迦本人更感興趣。當年中共解放南京時潘尼迦也留下沒走，印度報刊上有人諷刺他，畫了一副潘尼迦全身塗著紅油漆站在打腰鼓的人群中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的漫畫⁴⁴。

杜魯門總統在接到警告後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他聯想到第二天聯大將就「穩定全朝鮮局勢」的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如果這個議案得以通過，那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有權在北朝鮮作戰」，他最後得出結論：「和這個報告有關的潘尼迦先生在過去是經常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傢伙，因此他的話不能當作一個公正觀察家的話看待，充其量不過是個共產黨的傳聲筒罷了」⁴⁵。美國人的遲鈍、缺乏悟性，固然令人遺憾，但中國人也應反省，此時請印度做「紅娘」是否明智。

回顧現代國際關係，其中不乏因選擇了稱職的中間人而使僵持複雜的局面有所緩和或取得重大突破的範例。

巴基斯坦在50年代是一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以後也一直與美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同時巴基斯坦非常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60年代以後，中巴兩國關係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1965年美國正在中國周邊越南打另一場有限戰爭。這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訪路過巴勒斯坦，在同阿尤布總理會談時，就美國對越南北方進行狂轟濫炸的嚴峻局勢，要求巴基斯坦轉告美國政府，美國擴大對越南的戰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等等，其態度異常嚴厲。1966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伊查茲·侯賽因時，又將上述講話的要點再次通過該報公開報導。美國政府在接到巴基斯坦私下和公開傳來的信息後，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逐步降級，並且，「以後注意中國要人的一言一行來指導越南戰爭」⁴⁶。

1969年7至8月間，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森作環球旅行訪問。這一時期美國正被越戰所困，雖然上屆政府也曾與北越有所接觸，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8月2日，尼克森一行到達羅馬尼亞首

都布加勒斯特。尼克森深知羅馬尼亞與北越有良好的關係，「我知道我所說的一切都會傳達過去，所以我用同齊奧賽斯庫的一次會談來加強說明我給河內的信息」⁴⁷。齊奧賽斯庫答應，他將盡一切力量來促進美越談判。不過最後促成基辛格與春水秘密會晤的是一位法國人讓·桑特尼，此人與越南領導人包括胡志明在內，都有良好的私人關係。

齊奧賽斯庫總統是一位既能擁抱美國人，也能擁抱蘇聯人同時還能擁抱中國人的堅強的有主見的領袖。他對中美關係的解凍，以及後來中蘇關係的緩和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巴基斯坦在中美關係的解凍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貢獻，周恩來曾私下稱讚巴基斯坦是稱職的「紅娘」⁴⁸。

70年代初，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萌發了改善西德同阿爾巴尼亞之間關係的念頭，他考慮如果要找人傳信的話，那一定得請中國人⁴⁹。

我們從以上這些事例中不難看出，矛盾或衝突雙方之所以認同「紅娘」，是因為這些扮演「紅娘」的國家或個人，首先就是衝突雙方共同的朋友，或取得了當事雙方共同的信任。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後，印度與美國以及與新中國的關係。

1949年秋，美國久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攜夫人旅行。他們夫婦到達印度，在與尼赫魯總理進行了兩次長談後，李普曼得出結論，美國在同蘇聯進行的這場冷戰中，印度人不可能加入美國盟國之列⁵⁰。

1949年10月11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這之前他曾接到杜魯門總統敦促印巴兩國接受聯合國提出在喀什米爾安排停火、撤軍建議的信。尼赫魯因美國插手喀什米爾問題爾惱怒，他拒不接受這個建議。尼赫魯當時是「亞洲最為重要，最有口才的領導人物」⁵¹。在此次訪美中，東道主為他忙碌奔波，而接待他的正是國務卿艾奇遜。為了取悅他，艾奇遜想了不少辦法，但適得其反並沒有討得尼赫魯的歡心。因為印度人認為，美國在炫耀物質財富的同時，絲毫不掩飾他們企圖左右印度，使其支持美國反共冷戰的政策。兩國首腦的正式會談未能增進雙方的熱忱和理解，「大家都擺出一副紆尊降貴的樣子」⁵²，接下來的艾奇遜與尼赫魯私人會晤也不投機，尼赫魯先是大談荷蘭、法國在亞洲的過失，來含砂射影地批評美國人，更叫艾奇遜不滿的是，尼赫魯關於印度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算，艾奇遜認為尼赫魯的這個想法產生了很壞的影響，顯然對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有促進作用。而印度則對美國人的無知、偏見以及不現實的對華政策感到無法理解。接著當談到喀什米爾問題時，艾奇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出氣筒，會談直到第二天凌晨1點，勞碌了一天的國務卿已被弄得「糊裏糊塗」他有些不耐煩了。他最後這樣評價這次會談：「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信尼赫魯和我不是註定要有愉快的個人關係的」⁵³。這次訪美尼赫魯並不感到特別愉快，「從官方角度看完全令人失望」⁵⁴，「尼赫魯對於美國人的口氣正如美國人對他一樣傲慢，當時一些報紙也是如此報導的」⁵⁵。直到90年代後期中國有史學家才認為，尼赫魯此次「訪美回國後，印度與杜魯門政府的關係甚至比以前更糟了」⁵⁶。

尼赫魯總理於同年12月30日致電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表示印度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願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50年1月4日，周恩來以外長的名義複電尼赫魯，表示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印度建立外交關係，並希望印度政府派代表

來北京就建交問題進行談判。印度是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第一個國家，中國政府對此十分重視。經過雙方努力，兩國商定於1950年4月1日建交⁵⁷。1959年中印爆發邊界衝突以前「同中國友好曾經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制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⁵⁸。

1950年4月24日，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兩個月前，美國駐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對另一位到印度訪問的美國著名記者、作家賽利·蘇茲貝格說：「尼赫魯有某種內心的秘密，他有強烈的反美情緒……尼赫魯從政治信仰上說，是一個社會主義，他過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尼赫魯不喜歡俄國的專制體制，但是可能在他內心深處的反俄情緒要比反美的情緒少些」⁵⁹。不排出亨德森對尼赫魯可能帶有某種偏見，但考慮到這種評價是出自美國駐印度大使之口，就不能忽視其重要性和影響了。

兩天以後，蘇茲貝格拜會了印度總理，他一開口便問尼赫魯，他認為美國應在亞洲採取甚麼政策，尼赫魯的回答詞義模稜兩可、轉彎抹角，以至於講了一大堆蘇茲貝格還是不得要領，他就又重複問了一遍。尼赫魯又說：「……如果對民族情緒給予充分的激勵，同時輔以經濟發展，那就能夠吸引多數民眾」，他話鋒一轉又講，「我想絕大多數明智的人們不會把美國看作殖民主義大國的，但是我覺得，還有不少是抱著一種含糊不清態度，主要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面非常強大的國家，就以今天英國與印度的關係來說，他們再要把政策強加於我們，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害怕，但是過去的疑慮還沒有完全消除」⁶⁰。

法國歷史學家讓-巴蒂斯特·迪羅塞爾在總結印度建國十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時評論說：「印度一直仍然努力做一個能夠發揮世界作用的國家，這當然是和它的領袖信仰費邊社會主義和甘地主義的尼赫魯和某些象長期擔任印度駐聯合國代表的克裏希納·梅農那樣的政治家的理想分不開的，印度希望做『中立主義』政策的捍衛者和世界反殖民主義的領袖，這樣，印度必然要走上總是要反對西方，首先反對美國的道路」⁶¹。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英國和印度都主動地向各方和聯合國，提出了和平解決這場衝突的方案。印度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進行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其人數之多令人咋舌。他們分別提出了一些和平建議，而「每個人推薦的方案都不是完全一樣的」⁶²，這使得人們對印度人辦事的可靠性和權威性甚至動機都產生了疑問。他們那些方案總的觀點是，聯合國應接納中國進安理會；再由有五大國參加的安理會支持停火，迫使北朝鮮軍隊撤至三八線。但是，這一方案在私下都沒有獲得兩個大國的認可，美國不同意方案的前半不分；蘇聯則不同意方案的後半不分。這樣尼赫魯又在7月13日正式給斯大林和艾奇遜分別寫信，提出一個艾奇遜稱之為比印度私下拿出的方案「更令人不滿的建議」⁶³。艾奇遜說：「雖然這個建議的邏輯含混難解，但其意圖是非常清楚的……不需要任何人給我出主意就可以下決心」。⁶⁴斯大林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於7月15日致電尼赫魯同意接受他的建議。7月17日，印度駐美國大使，潘迪特夫人要求會見艾奇遜，但她帶來的除了那個「建議」外，並沒有甚麼新的內容，而她當面陳述「建議」的言辭和儀態卻加深了艾奇遜對印度人的反感，「我從小有一個幻覺，至今還未完全忘記，即，如果地球是圓的，印度人一定是頭朝下的——或者，是顛倒過來的」。⁶⁵艾奇遜於7月18日致電尼赫魯，拒絕了他的建議。

總之，印度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具有傾向性，且不說是否公允。雖然中國對印度的外交活動，特別是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表示感謝⁶⁶，但美國人感到印度並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印

度在地理位子上與中國是近鄰，兩國又剛建交互派了大使，印度還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看似對印度作為中間人很有利的特殊條件，現在反而變成印度不能取信於另一當事方的原因之一，印度的言論「縱然是並無他意的正面論述，也往往被認為是為中國辯護」⁶⁷。美國把印度與英國的和平外交活動區別對待，認為對英國人的評價「是不適用來描繪印度人那種政策的」⁶⁸。這一時期印美兩國關係並不象中方所認為的那麼好，加上兩國領導人之間又沒有良好的私人關係，所以印度在這場危機中是不適宜做中間人的，中國請印度做「紅娘」是不明智的。這表明中國對當時的國際關係，特別是印美關係還不甚了解。

中國官方承認「在當時，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在朝鮮戰爭期間許多重要的立場和態度，是通過印度政府轉告西方國家的」⁶⁹。事後，時任印度駐美國大使潘迪特夫人1952年5月在與周恩來的一次談話中說：「每次您與潘尼迦大使談話後我都從我們政府得到指示，並即刻與美國國務院聯繫」⁷⁰。雖然很多人特別是中國學者認為，中美衝突有其必然性，但中國請印度做「紅娘」卻留下了遺憾。一個不好的信使比沒有信使情況會更糟。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裏的尤三姐。

尤三姐與封建大家族賈府沾了一點親戚關係，賈府裏的公子哥璉二爺不久才勾引了她的姐姐，這樣尤三姐與這個封建大家族的關係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現在璉二爺又來給內娣做媒。定親後尤三姐的意中人柳湘蓮有些疑惑，怎麼「女家反趕著男家」。他多少還受到中國民間一句玩笑話，「姨姐、姨妹半個妻」的影響，加上又聽到一些傳言，認為「東府裏除了那兩隻石獅子乾淨外，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柳反悔拒絕承諾這門婚事。尤三姐感到自己就是跳進長江也洗不清，她在退還「定禮」——鴛鴦劍給柳湘蓮時，突然抽劍自刎，死在了她所愛的人懷裏。柳悔恨莫及削髮進了佛門⁷¹。「紅學家」大都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這一悲劇。不過，仔細想來，人們不難從生活的體驗中發現，尤三姐雖然有個性，是在爭取婚姻自由，但她在選擇媒人的問題上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最後成為悲劇性人物。其實媒人不一定非常了解你——那是如何做媒人的學問。而請媒人千萬要注意，媒人與你關係過密並不是一件好事，媒人與那個「他(她)」的關係卻至關重要，關係越好，你成功的希望就越大，關係一般那還不要緊，不過這已說明你在這方面需要向有經驗的人請教了，但若你的意中人對你請來的媒人很反感，這可是滅頂之災，說不定對你來說這門美滿的婚姻就因為你這一時的疏忽而給弄砸了。

二十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有學者在總結周恩來總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時，就周在1966年前後因美國對越南轟炸升級一事，兩次通過巴基斯坦「鴻雁傳書」給美方取得良好效果而感慨道，「顯然，通過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巴基斯坦來傳話效果就大不一樣……」⁷²，認為這次美國在接到信息後的反應是吸取了上次在朝鮮的教訓。⁷³反過來琢磨，中國人自己是否也應從中悟出點甚麼道理呢！

「從威懾的觀點看，表面的虛弱和實際的虛弱將產生同樣的結果」。⁷⁴中國人的聲明、警告最終被杜魯門政府理解為「虛聲恐嚇」，周恩來總理的這次外交努力歸於失敗。

看來信使有時往往比信本身還要重要，日常生活中是這樣，國際事務更是如此。

- 1 《基辛格的總構想》，[美]沃·納特著，商務印書館（內部發行），1976年，第5頁。
- 2 《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1974年，第405頁。
- 3 《光榮與夢想——1932—1972美國實錄》第二冊，[美]威廉·曼徹斯特著，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764頁。
- 4 同註2，第405、410頁。
- 5 同註2，第428頁。
- 6 《艾奇遜回憶錄》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77年，第282頁。
- 7 《從雅爾達到板門店》，華慶昭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22。
- 8 《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第347頁。
- 9 《在最高統帥部當參》，華慶昭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22。《毛澤東軍事文選》謀——雷夫英將軍回憶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61頁。
- 10 《兩大領袖斯大林與毛澤東》，[俄]尤·米·加列諾維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8頁。
- 11 同註9。
- 12 《抗美援朝戰史》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歷史研究部著，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91頁。
- 13 《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83頁。
- 14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費正清、麥克法誇爾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2頁。
- 15 同註10，第469頁。
- 16 《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內部發行），第98—99頁。
- 17 同註16。
- 18 同註12，第92頁。
- 19 同註12，第95頁。
- 20 同註2，第462頁。
- 21 同註2，第457頁。
- 22 同註2，第458頁。
- 23 同註2，第457頁。
- 24 《大外交》，[美]亨利·基辛格著，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30頁。
- 25 《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美]亨利·基辛格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77頁。
- 26 同註25，第18頁。
- 27 同註7，第214頁。
- 28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美]鄒儻著，第496頁。
- 29 同註13，第74頁。
- 30 《麥克亞瑟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80頁。
- 31 《秘密使命》，[美]弗農·阿·沃爾特斯著，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第22頁。
- 32 同註28，第496頁。
- 33 《朝鮮戰爭》上部，[日]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第2版，第633頁。

- 34 同註24，第433頁。
- 35 《毛澤東與抗美援朝》，逢先知、李捷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2頁。
- 36 《周恩來總理生涯》，熊華源、廖心文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頁。
- 37 《漫長的戰爭》，[美]約翰·托蘭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47頁。
- 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8》，裴堅章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89頁。
- 39 同註12，第135頁。
- 40 同註12，第135頁。
- 41 同註12，第135頁。
- 42 《美國智囊六人傳》，[美]沃爾特·以撒森、埃文·湯瑪斯著，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553頁。
- 43 同註12，第138頁。
- 44 《釣魚台檔案——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重大國事實錄》，紅旗出版社，第519頁。
- 45 同註2，第432頁。
- 46 同註33，第571頁。
- 47 《尼克森回憶錄》，第228頁。
- 48 《周恩來的外交藝術》，季明、劉強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68頁。
- 49 《會見與思考》，[德]維利·勃蘭特著，第536頁。
- 50 《李普曼傳》，[美]羅奈爾得·斯蒂而著，新華出版社，1982年，第688頁。
- 51 《英迪拉·甘地》，[印]克里尚·巴蒂亞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8頁。
- 52 《印度總理尼赫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8頁。
- 53 同註6，第212頁。
- 54 同註52，第149頁。
- 55 同註51，第159頁。
- 56 同註52，第151頁。
- 57 同註38，第96頁。
- 58 《印度對華戰爭》，[英]內維爾·馬科斯韋爾，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第1頁。
- 59 《七大洲風雲四十年——回憶錄萃編》上冊，[美]賽·利·蘇茲貝格，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1頁。
- 60 同註59，第153頁。
- 61 《外交史》下冊，[法]讓－巴蒂斯特·迪羅塞文，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217頁。
- 62 同註6，第286頁。
- 63 同註6，第286頁。
- 64 同註6，第287頁。
- 65 同註6，第287頁。
- 66 同註52，第184頁。
- 67 同註33，第506頁。
- 68 同註6，第283頁。

- 69 同註12，第138頁。
- 70 同註12，第138頁。
- 71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情小妹恥情歸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 72 同註48，第165頁。
- 73 《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22頁。
- 74 同註25，第18頁。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2006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